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经济学家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主编：胡长青 执行主编：詹小洪

茶座

2015.1 总第67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责任编辑/周云龙 封面设计/祝玉华

王松奇/2015不是「中国世纪元年」

陆铭/中国研究的贡献：可能性与可行性

梅新育/资源民粹主义的挽歌

于晓华 孙菲菲 魏 昊/中国经济学科科研机构发表国际论文的龙虎榜

俞景华/学术如戏，戏如学术

梁平汉/死海之滨的经济理论联欢

周 文/经济学向何处去

邱 斌/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也谈经济学的学术史梳理

党 印/鸡蛋要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聂辉华/为什么灵山的佛塔那么高？——西游记经济学之六

朱 玲/康藏记忆

章 元 王元达/「龙」与「象」的经济马拉松

张宇燕/作为一种传奇的乒乓球发展史

黄少安/公权的滥用与私权的膨胀——以「钉子户」为例

王 军/雾霾三问

胡东林/「经济学家家的天职」——访张卓元教授

徐卫国 黄英伟/人民公社社员的生命「工资」：粮食

詹小洪/「爱国消费」在韩国风光不再



ISBN 978-7-209-08975-3



9 787209 089753 >

定价：18.00 元

- 章元 王元达 “龙”与“象”的经济马拉松 / 096
 张宇燕 作为一种传奇的乒乓球发展史 / 101
 赵世勇 肖晓仪 关于机会成本的师生对话 / 104
 郭金喜 广场舞冲突及其治理的公共经济学解析 / 110

经济评论

- 黄少安 公权的滥用与私权的膨胀
 ——以“钉子户”为例 / 115
 王军 雾霾三问 / 118
 乔岳 云的归属 / 124
 陈宪 公共物品性质及其与公用事业边界之辨析
 ——以公路和出租车为例 / 127
 郑联盛 公交车线路调整的改革映像 / 132
 张清津 道路交通的制度隐喻 / 137
 周业安 收入不平等背后的影子之手 / 141

经济学人

- 胡东林 “尽经济学家的天职”
 ——访张卓元教授 / 146

经济史话

- 徐卫国 黄英伟 人民公社社员的生命
 “工资”：粮食 / 152
 张忠民 1954：上海的扩展“公私合营” / 158
 王小嘉 人民企业公司 / 164

他山之石

- 詹小洪 “爱国消费”在韩国风光不再 / 169
 吴崇伯 印尼新总统佐科的海洋强国梦 / 1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67辑/
 胡长青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4

ISBN978-7-209-08975-3

I. ①经… II. ①胡… III. ①经济
 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第095742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3
 Email: chazuo8903@126.com
 QQ群: 311957096
 微博: weibo.com/sdpress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1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8.00元

小文章大智慧 / 封 进

《经济学家茶座》文章的风格与经济学随笔或专栏类似，文章通常不过两三千字，没有足够的篇幅施展技巧，容不下过细的分析，但要有思想、有故事。作为《茶座》的读者，我喜欢读那些富有启发或观点犀利或娓娓道来的文章；作为《茶座》的作者，深知文章虽小，却如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许多经济学家的文字表达并不尽如人意，可能是因为现代经济学流行的是用数理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正如一篇著名的文章，《经济学帝国主义》所指出，经济学拥有一套严密的语言，这套语言可以把复杂的概念用简单、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使经济学家免于复杂现象的羁绊。不过，在大众或政府面前，用这套方法过于理想化，并不一定让人信服。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在回答大众期待的问题时，采用千篇一律的经济学家思维方式，反而显得平庸。

另外，写惯学术文章的人不喜欢面面俱到，通常一篇文章只验证一个假设。比如，很多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克鲁格曼曾经说过，这是令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着迷的问题。有人论证制度的决定作用，有人论证地理的决定作用，有人试图说明随机冲击的影响，但不会将这些因素放在同一篇文章中，尽管很多人相信他们都很重要的。所以一篇文章，甚至数十篇文章，都不可能让人了解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强调方法的科学性和证据的可靠性，但一篇文章所能提供的政策含义常常十分有限。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并没有借口回避包罗万象的现实问题，只能要求自己具备更为综合的能力，以消除学术研究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凯恩斯早就说过：合格的经济学家必须兼具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及哲学家于一身，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由此可见，自认为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科学的经济学家实际上需要比自然科学家更有智慧。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不懂世间俗务，大概不会妨碍他做好学问，但经济学家不仅要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精于学术，还要洞明世事、善解人意。比如，面对千头万绪的影响因素，你抽象出哪几个变量？面对各种形式的效用函数，你选哪种？诸如此类的选择光有学术经验肯定不够，还得依靠对日常事务的体验或生活常识等。

中国经济学家似乎面临更大的挑战，同时又被赋予更多的使命。所用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西方，所要回答的是前所未有的中国问题。既要写能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英文文章，又要写能被政府部门采纳的政策报告。学界已经提炼出一个词，叫做“顶天立地”，比凯恩斯提出的标准更言简意赅。我想《茶座》可以成为经济学作者们演练这种“顶天立地”功夫的场所，让小文章闪耀出智慧的火花。



经济学家茶座

总第六十七辑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晓 荆林波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编

胡长青

执行主编

詹小洪

项目负责人

周云龙

卷首语

封进 小文章大智慧 / 001

国是我见

王松奇 2015 不是“中国世纪元年” / 004
陆铭 中国研究的贡献：可能性与可行性 / 008
梅新育 资源民粹主义的挽歌 / 013
皮建才 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四大陷阱 / 019
高明华 官商勾结中的公司治理错位 / 023

学界万象

于晓华 孙菲菲 魏昊 中国经济学科研机构发表
国际论文的龙虎榜 / 028
俞景华 学术如戏，戏如学术 / 036
包特 话说审稿 / 039
梁平汉 死海之滨的经济理论联欢 / 042
沈凌 中国的“青椒”真的很穷吗？ / 048

学问聊斋

周文 经济学向何处去 / 050
邱斌 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
——也谈经济学的学术史梳理 / 056
朱富强 行为经济学对流行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 060
刁仁德 不列颠王室的信息经济学 / 065
李晓平 经济学究竟有没有用？ / 070

生活中的经济学

党印 鸡蛋要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 / 076
周勤 攒蛋游戏为什么会如此流行？ / 078
黄漓江 从过年回家看选择的拓展 / 083

经济随笔

聂辉华 为什么灵山的佛塔那么高？
——西游记经济学之六 / 086
朱玲 康藏记忆 / 090

- 章元 王元达 “龙”与“象”的经济马拉松 / 096
 张宇燕 作为一种传奇的乒乓球发展史 / 101
 赵世勇 肖晓仪 关于机会成本的师生对话 / 104
 郭金喜 广场舞冲突及其治理的公共经济学解析 / 110

经济评论

- 黄少安 公权的滥用与私权的膨胀
 ——以“钉子户”为例 / 115
 王军 雾霾三问 / 118
 乔岳 云的归属 / 124
 陈宪 公共物品性质及其与公用事业边界之辨析
 ——以公路和出租车为例 / 127
 郑联盛 公交车线路调整的改革映像 / 132
 张清津 道路交易的制度隐喻 / 137
 周业安 收入不平等背后的影子之手 / 141

经济学家

- 胡东林 “尽经济学家的天职”
 ——访张卓元教授 / 146

经济史话

- 徐卫国 黄英伟 人民公社社员的活命
 “工资”：粮食 / 152
 张忠民 1954：上海的扩展“公私合营” / 158
 王小嘉 人民企业公司 / 164

他山之石

- 詹小洪 “爱国消费”在韩国风光不再 / 169
 吴崇伯 印尼新总统佐科的海洋强国梦 / 17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67辑/
 胡长青主编.
 一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4

ISBN978-7-209-08975-3
 I. ①经… II. ①胡… III. ①经济
 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95742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3
 Email: chazuo8903@126.com
 QQ群: 311957096
 微博: weibo.com/sdpress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1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8.00元



2015 不是“中国世纪元年” / 王松奇

2015 年 1 月号《名利场》杂志刊登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声称“中国世纪从 2015 年开始”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论。赞成者的意见以中国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在 2014 年年底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近两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采取的新动作展现的新形象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为论据，说明“中国世纪元年”好像真的到来了。也有学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只像 1872 年的美国，在这一年美国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第一次超过英国，但世界真正进入“美国世纪”却是到一战后，这期间的条件准备共持续了 40 多年。

为什么“中国世纪元年”问题不是出自中国学者之口却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我想其基本原因不是中国学者迟钝，而是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评价问题存在着外高内低的现象。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中国要韬光养晦，目的就是努力争取尽可能长一些的和平安发展赶超先进的时间，这是极富远见和实用战略价值的国策指导意见，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和现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之间，仍然在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从综合实力比较上打比方，那就像是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中国篮球和美国 NBA 之间的差距。古人云“知耻而后勇”，只有清醒地看到方方面面的差距，认真总结出产生差距的原因，群策群力地探求出弥补差距和有可操作性的赶超战略，中国才能真正把 21 世纪变成“中国世纪”。那些盲目自大、故步自封、强词夺理式的自吹自擂行为只会害了我们自己，也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作为一个肯为中国长远发展着想的学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国情调研，扎扎实实地进行国力分析，细致缜密地研究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不断提出有操作意义的改善改进意见，使中国少走弯路，尽快地令世界大多数人心服口服地步入“中国世纪”。

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已接近执行尾声的“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个规划尽管在制定时动员了举国之力，按决策者的初衷是要订立出一个“人人满意的规划”，但从执行结果看，规划的效果同设计初衷仍存在相当的反差。2014 年以来，中国之所以出现了“新常态”这样的流行语，它可能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们在制

定“十二五”规划时的若干个“没想到”，即设想经济增速的换挡来得这样突然，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竟如此剧烈，2008 强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影响竟如此广泛深远。但这三个“没想到”总难免有找客观原因之嫌，我觉得，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中短长期问题，只有不断从主观上找原因，即从战略思路、政策设计、执行落实、激励惩罚等方面进行反思和检讨，我们才能不断矫正失误、少走弯路。从近几年宏微观经济运行实践看，“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用拉动国内消费需求来增加经济发展动力的思路无论从政策方向还是落实方法上都存在一定问题。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消费需求潜力巨大，这不容置疑，但从中国城乡居民储蓄率居世界前列及中国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不久的国家且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存在大量欠账的国情看，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还是应当以投资为主要经济动力，消费需求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无法对经济提供充足动力，这一点已从近几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增速均不足 13% 这一点可以看出。所以，从这一点说将国内消费作为经济主要动力这一政策选择方向就不大对头。其次，从发达国家情况看，城乡居民家庭消费需求大宗支出通常都是住房支出，但中国近些年居民购房需求因房地产调控政策却成了压制对象，这种近于矛盾的实际举措表明中国许多以智库自诩的机构存在严重的知识缺陷。另外，“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当然没错，但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者的关系上，我们是否还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呢？我有个不很成熟的想法，我认为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出息，最终要看这个国家能不能在经济起来以后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创造能力的标准应当是科技和制造业，而不是什么服务业。马云的阿里巴巴美国上市，已创造出一个民营服务业发展的现代神话，但马云有什么？不就是让中国人买便宜东西更方便一些吗？将来能让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扬眉吐气的东西，一定是工业先进成果，而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中国在即将着手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定要突出强调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并将之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来执行。而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关系上，则应明确主次，投资需求为主消费需求为辅，这种经济引擎结构位置关系决不能错乱。

如果能确立制造业优先的战略，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 2013 年德国政府推出的“工业 4.0”国家战略规划，看看人家是如何将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放在战略日程头号地位的。我 2008 年去过德国一次，那正是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时期，虽然我们到过的德国城市虽然只有慕尼黑和法兰克福，但已感受到德国经济状况与法国情况的极大不同，这里到处生机勃勃，下榻酒店的自助餐供应也极为丰盛，人们在餐厅里吃饭的气



氛热热闹闹，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的法国巴黎的景象只能用冷清来形容。德国之所以能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我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制造业过硬。在欧洲也有以服务业发达著称的国家例如冰岛，在全球金融危机前曾被许多政要和经济学家大加赞扬，但2008年危机到来时，几乎是一夜之间，冰岛就到了国家差点儿破产的地步。讲这两个例子，就是希望决策者应当清醒地面对中国制造业严重不景气，而金融业包括所谓互联网金融现在虽然红红火火，但资金在业内空转层层取利的现象已经十分危险，我们必须尽快研究如何矫正这一现象的政策措施，出台一揽子方案，保障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特别优先支持制造业。在政策工具选择上我们的决策层有丰富的经验，如差别税率、贷款贴息等等许多可采用手段。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实在太太大，如买飞机、进口汽车生产线我们花的钱已达天文数字，但我们生产一辆像样的汽车和飞机出来了吗？再举例说，国人颇为引以为自豪的高铁，克强总理出国总是亲自当推销员把它作为能够走出去的一个值得骄傲的品牌，但高铁三大核心技术——牵引、制动、自动控制，到现在我们只掌握其中的两项，制动技术只能依靠德国。再说说高铁列车的车轴，我们一根也造不出来，全部依靠进口，因为我们的材料工艺不过关。顺便说一说美国，美国2014年三季度GDP增长率竟达5%，美国的5%是什么概念？在我看来，美国GDP增长3%就相当于中国的7%~8%，如果达到5%，那就相当于中国的GDP年增9%以上。美国自2008年危机后强力复苏的奥秘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计划，是制造业的强力复苏支撑了美国经济最早走出衰退停滞泥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火车头中国自己的制造业却走到了“工业铁锈时代”悬崖的边缘，而且直至现在我们还未进行战略反省。

2015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在思路我们似乎还未产生大的突破，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迟钝，现在还很难说会出现什么能扭转制造业颓势的大事件，因此，斯蒂格利茨所说的2015是“中国世纪元年”的根据实在有些不足。除忽略制造业重要性这一点外，我们还要从理论上正视投资需求的巨大作用问题，无论从拉动经济上还是从部分地缓解产能过剩上，“铁公基”仍是经济增长利器，这一点毋庸置疑。看看近两年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运行情况就知道，只有建筑业还在保持旺盛的势头，中国产业走出去时，从目前情况看也只有建筑业最有竞争力。好多人诟病中国基建投资过度，但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只要能消化过剩产能，只要能给国民留下一大批优良基础设施，即使经济效益稍微差点儿也值了。我们可以简单算一笔账，

钱投在国内产生各种派生收入，财富留在了国内，这比在国际上给人白送钱强得多。管理国家就像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首先你得能挣钱，然后才是会花钱，若是光会花钱不会挣钱，家底无论如何殷实也总有吃光花光的一天。所以我们在调整长期战略思路解决中期结构调整问题时也不能忘了经济增长刺激这个短期宏观问题。我个人觉得，只要财政政策不小气，货币政策不迟钝，中国的经济增长局面肯定就会改善多多。强劲的增长势头，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引擎的角色，这是“中国世纪元年”的必要条件之一，什么叫必要条件？形式逻辑的规定是：有A未必有B，无A一定无B。所以保持一个不算低的经济增速也绝非无关紧要之事。我们的决策层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想得开一些，该刺激就刺激，该支持“铁公基”就支持“铁公基”，该调整制造业思路就调整制造业思路，这样“中国世纪元年”到来也许会快一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研究的贡献： 可能性与可行性 / 陆 铭

我有一个奇谈怪论：学术需要贸易，国际学术交流就是国际贸易，而决定贸易模式的基本原理就是“比较优势”。我是经济学家，解释“比较优势”是我的职责，它的意思是，当一个国家样样都不如别国的时候，要扬长避短，拣相对来说更有优势的来做，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有竞争力。

当然，“比较优势”原理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对于个体，有两种情况不适用：一是已经具备了某种技术上的“绝对优势”的，不必委屈了自己的能力；二是不参与贸易的，完全可以仅仅出于兴趣来做事，这是更高的境界。经济学相信分工是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而且贸易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如果说学术是个例外，我想不出闭关自守会有利于学术的理由。当然，不是每一项研究都需要用于贸易，说到底，兴趣还是第一位的。

接下来的话是对有志于从事中国研究的人们说的。我认为中国问题可以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如果要给一个定义的话，学术前沿在我看来就是未知且重要的问题。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仅以人口和经济的体量，世界上就不会有人认为中国问题不重要。但仅有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假设现有的西方主导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文献已经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那么，中国问题就只是现有理论的实验场。中国问题的前沿性在于，对它的理解远远不够。我不是说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恰恰相反，已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于中国（包括贸易与增长的关系），但是，还不够，而就这“不够”的那一部分，不就是前沿吗？

作为“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

近年来我常说，中国之独特性在于，这是一个“转型与发展中大国”，将“转型”“发展”和“大”这三个特征集于一身的，可能独此一家，而且，这三个特征对于中国的

影响也是相互嵌套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到201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只有55%；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地区间禀赋差异明显，各个地区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很强，如果地区之间实现有效的分工，大国优势对于中国的发展将极其重要；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至今在很多方面仍然带有强政府干预的色彩，尤其是它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还远未市场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有很多理论问题都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价值。我曾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的时候，围绕着发展、转型和大国三个方面，谈了中国研究的一般意义。

第一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从落后走向发达，这一块的研究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界还比较薄弱，因为主流经济学描述的主要是已经成熟的经济体，而不研究结构转换的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可以推广的机制，比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这种问题是可以上升到一般理论的。

第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制度转型相对来说不是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但是现在一些新兴国家，包括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国家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很多国家都存在一个从不完善市场向完善市场过渡的状态，那么如何实现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否具有一般的规律？比如，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教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制度（包括具体的政策）从一种状态转型到另一种状态，其触发机制是什么？等等。事实上，涉及制度转型的理论也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一些新见解的。

第三是大国治理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大的经济体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世界上有很多很大的经济体，比如印度、欧洲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大的经济体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怎样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种结构最终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绩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这只是举三个例子，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里还不是很深入。中国的经济学者是可以基于本土的经验，为这些理



论做出贡献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工作才刚刚起步，要真正形成成熟的理论，并且可以上升到一般性可以推广的理论，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中国特色”还是“中国模式”？

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思考两个概念的差别，即在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中，哪一些是属于过渡性的，哪一些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比较稳定的。如果中国的很多结构性特征只是过渡性的，未来可能会收敛到人类已知的某种类型的制度上去，那么，中国现有的特色就没有那么大的理论意义了，剩下的，可能只有制度转型过程的理论意义。但是，假设过了二三十年以后，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且仍然具有与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治理结构，在政治或社会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就很可能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问题在于，以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直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都能研究清楚，的确可以对全人类的智慧做出贡献。在没有研究清楚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要谨慎，除非把“中国模式”作为一个中性的提法，而不强调其积极作用。

我自己比较倾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等进入发达状态之后，中国的体制仍将保持一定的特色。这种特色所形成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就像在市场经济模式中，有英美体制与欧洲大陆体制的差异一样。即使在英美市场经济体制内部，英国、美国、加拿大都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在欧洲大陆体制内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有各自不同的体制。如果看到这一点，作为学者，就有必要进一步回答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特色，究竟有哪些是“发展”意义上的，最终会不复存在的？而又有哪些特色是“比较体制”意义上的，在较长的时段内都会持续存在？

在保持那些“比较体制”意义上的特色的道路上，中国如何从当前的制度过渡到未来的制度？哪些条件或触发机制会推动这样的制度转型？有没有制度转型的时间表和急剧转型的转折点？

中国特色的道路（或模式），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

如何看待中国研究的质量

中国学者应该能够基于中国的实践来提出一些大的理论构建，但在这个大的理论构建完成之前，对于这件事仍然还停留在“相信”的阶段，因为，当我们想了很多大问题之后，仍然会发现，对于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都还不清楚。也正因此，

我认为中国研究还处在大量从事经验研究 (empirical study) 的时期。

我不赞成用方法的复杂性来判断中国研究的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非常重要的前沿性的问题,有时候,将问题提出来就已经非常重要,而由于中国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处在起步阶段,数据的积累非常不够,限制了一些方法的运用。而那些能够运用较为复杂的方法的问题,却往往已经是被学术界反复加以研究的问题,在问题意识上未见得是前沿的。

举例来说,在教育经济学研究里,估计“教育的回报”简直就是一个各种“尖端武器”的实验田,在技术上复杂程度最高。但在中国,除了需要一般性地估计出教育的年数所带来的回报,也需要估计将政府的教育财政资源投向农村或城市,投向基础教育、技能培训或高等教育,哪种投资回报更高。而一个更为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则是,是否应该设计一种机制,来让政府投向欠发达地区(或农村)的教育资源成为一种可携带的资源,来让跨地区流动的人口(或进城农民)携带到其就业所在地,解决随迁子女在其父母工作地接受教育的问题。上述第二、三两个问题已经涉及了城乡间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和地区之间的关系。

我不敢贸然在上述三个有关教育的问题之间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但我能确定的是,后两个问题的研究非常少,而且可能也正因为这样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的基础薄弱,数据积累不足,甚至根本没有相关的数据。从发表来说,第一个题目如果能进一步有边际上的贡献,可能能够发表到不错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去。对于后两个问题的研究,当然也有可能发表到国际学术期刊,但其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在短时期里,相应的研究可能还无法在方法上用到被国际学术界认为足够精确的方法。坦率地说,我不认为后两个问题(即使最终没有发表到国际一流期刊上去)就不是前沿研究。

在最近这些年来,中国研究的质量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在国际上的发表数量和质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我还是认为,在国际发表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急不来的。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今天有关中国问题的国际发表是建立在大量之前的中文文献基础之上的,而今天发表的那些中文文献也是在为明天更好的国际发表打基础。换句话说,只要在当下的条件下做到了最好,推动了研究的前沿边界,这样的研究就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可以说,一项研究是不是前沿,与它发表时用的语言并无必然关系,但是否用英语发表的确影响到一项研究得到国外同行的接受度。

在社会科学的大家庭里,越是与制度、历史这些因素相关的学科,越是偏“软科



学”，而越是与制度、历史无关的学科，则越偏“硬科学”。以我所在的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为例，管理科学总体上来说偏硬，而经济学则偏软。在经济学内部，研究方法论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理论偏硬，而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则偏软。从发表上来说，越偏硬的学科，抽象掉了具体国家的背景，越容易在国际上交流和发表，实现“与国际接轨”。而偏软的学科，特别是重应用的研究，其重要性和研究的价值往往在特定的制度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才更能凸现出来。如果我的这个说法是道理的，那么，就不妨对于中文文献再多一些重视，特别是真实刻画中国当代发展的那些文献。不管考核制度是否重视，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至少要求自己在研究中重视并引用中文文献。

作为一个工作在中国的中国学者，对于那些重要的问题，就应该做。发表到哪是重要的，但我不认为这是唯一重要的。在这种问题上去争个理出来，没什么必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争辩一下，我就倔强地说，研究自己的祖国，别问我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必须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资源民粹主义的挽歌 / 梅新育

从2014年6月到2015年1月,国际市场油价暴跌六成,21世纪初开始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就此彻底结束。从尼日利亚、南非到巴西,从海湾石油君主国到曾经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俄罗斯,那些在此前十年初级产品牛市期间享受了轻松惬意好时光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在熊市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折的夹击下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急剧下滑,财政收入骤然萎缩,国际收支迅速恶化,货币汇率大幅贬值剧烈震荡……未来随着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他们的日子多半还会进一步恶化。此时此刻,反思资源民粹主义之误,正当其时。

一、何谓资源民粹主义?

何谓资源民粹主义?这种思潮是将某种自然资源视为只有产地当地居民、甚至只有产地某一民族的居民才能使用、享受其收益的财富,即使没有为此种资源开发付出任何劳动也要理直气壮利益均沾,不分青红皂白给外来投资者、劳动者和下游用户买主扣上“掠夺资源”之类唬人高帽。对内,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议制民主竞选政体更为这种一厢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澜,各党派、各竞选政客争先恐后提出各种无偿瓜分资源及其红利、增加福利的方案以讨好选民,给资源开发企业竭泽而渔的无度苛索包装上“社会责任”的外衣,其经济可行性和对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伤害则被置诸脑后。对外,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该国家/地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撕毁合同,违约提高税赋、分红、价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无门。

在初级产品牛市中,面对飞来横财似的滚滚金钱洪流,政府常常因财政危机暂时缓解而不愿冒险触动既得利益阶层,拖延结构改革,扩大无效率支出,给经济多元化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巨额石油美元等资源收入提高了各个利益集团

期望,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政府常常扛不住利益集团压力,被迫或主动追逐短期效应,铺张浪费,利用新增资源收入无节制地扩大社会福利,转移支付项目,上马效益不佳的公共工程,以便制造立竿见影的“政绩”,换取民意支持。即使廉洁的民选政权也无法避免上述通病,不廉洁政府就更谈不上什么坚持原则了。印尼前矿业与能源部长、经济学家穆罕默德·萨德利(Mohammad Sadli)曾指出“艰难时世造就明智政策,反之也成立”(Bad times make for good policies, and vice versa),确实是亲身体验的总结。

就总体而言,这种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分肥思潮在油气生产国/地区表现最为显著,但在其他大宗矿产资源生产国/地区同样甚嚣尘上。在此前十年煤炭、铜矿等初级产品牛市期间,蒙古各派政治力量经济政策主张竞争的焦点就是比拼谁更能投合不劳而获人性弱点提出离奇不靠谱的经济决策及主张,冷静理智彻底沦为牺牲品:

2008年议会选举成为蒙古民主党和人民革命党的全民分红承诺对决,双方竞相提高承诺全民每人分红金额,致使承诺分红总额达到24亿~35亿美元,超过2010年蒙古财政收入总量(25.6亿美元),接近蒙古2010年GDP(62亿美元)半数。

2011年,蒙古当局决定向全民每人分配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Erdenes-Tavan Tolgoi,亦称“珍宝TT公司”)股票536股,合计占总股本10%,而该矿的基础设施至今仍未建成,上市一再推迟后仍遥遥无期,连合作开发的外资财团也未落实……

有这般民众,有这般分光吃净式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无怪乎即使在前几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资源丰富的蒙古依然连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进而给蒙古宏观经济稳定埋下了地雷。而在牛市繁荣期间仍然连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甚至财政赤字的初级产品出口国绝不仅仅蒙古一家,巴西、南非等许多拉美、非洲国家都是如此。

对外部贸易伙伴与投资者,蒙古当局和企业、居民的违约行为已成家常便饭。从2012年7月塔旺陶勒盖煤田西区开发权招标结果出台后又被立马撤销,到2012年末至2013年初中铝与蒙古之间就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供货合同的纠纷,莫不如此。

在资源民粹主义泛滥之时,许多言行纯属十足笑柄,却能理直气壮在蒙古社会大行其道。2010年,蒙古1550家私营“领军企业”联合成立“蒙古人999民族财团”,竞标开发64亿吨储量的塔旺陶勒盖煤田,大肆宣扬声称“不需要外国人帮助,我们就能做好这件事”;但这些所谓的“领军企业”为此凑出的资金总额仅有100万美元,而这样一个巨型煤田开发总投资需要数十亿美元,超过蒙古当年GDP。

在国际经贸实践中,这种东道国/地区资源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违约风险远远不